血战任山河

——364名英烈为解放宁夏捐躯

彭阳境西、黄峁山东麓的罗家山脚下，就是当年曾被炮火烧焦和烈士鲜血染红的任山河战场。任山河战斗是波澜壮阔的西北解放战争中的一场激烈的战斗，由此揭开了解放宁夏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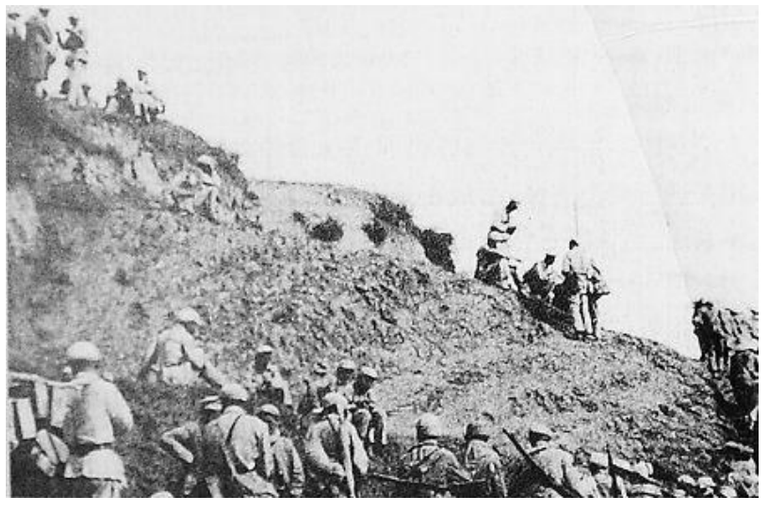
1949年，西北战场捷报频传。5月下旬，西安解放。眼看胡宗南独力难支，节节败退，蒋介石下令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逵出兵援助胡宗南。此时的胡宗南一如惊弓之鸟，与两年前进攻延安时相比，其嚣张气焰已荡然无存。经过扶眉战役解放军又歼灭其主力4个军约43000人，胡宗南只好将余部撤往川北和汉中，仅留一个兵团盘踞在宝鸡。解放军下一步的矛头所向，必然是甘肃、青海和宁夏。而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率领的青海陇东兵团、马鸿逵之子马敦静率领的宁夏兵团，见胡宗南大势已去，援陕无望，乃各自分头回窜，企图退守自己的老巢。我解放军19兵团63军、64军、65军则紧紧跟在马敦静的宁夏兵团后面，展开了800里追击战。7月底，宁夏兵团的主力被我63军、65军追到固原县城以南的三关口、瓦亭一带，我64军则离开西兰公路，取道直插固原县城，打算切断敌128军的后路，形成包围，达到全歼。这是一步绝招，如果成功，马鸿逵的老巢银川就会不攻自破。马敦静觉得危在旦夕，便在开城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命令马光宗的11军连夜于任山河一带抢筑正面10里、纵深30里的野战防御工事，妄图在此阻止解放军的攻势，守住“宁夏门户”。

任山河，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但村边那条道路是通往固原县城的必经之路，因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任山河村一左一右各有一个山头，左边的叫鹦哥嘴，右边的叫罗家山，两山相距不足千米，居高临下，像一把铁钳扼守着中间的道路和村庄。

8月1日，我64军主力进至固原县东南的任山河地区时，遇到敌11军168师的阻截。发现敌人正在这里构筑工事，企图占据山地有利地形阻挡我军前进。当天12时，军部命令191、192师向任山河地区的鹦哥嘴、罗家山和哈拉山等高地的守敌发起攻击，以求突破敌人的防线，拦腰切断敌128军等部的退路。罗家山和鹦哥嘴互成犄角，控制着通往固原的公路。山上，敌人构筑了一道道马蹄形堑壕，机枪、迫击炮构成一个密集的火力地带。总攻开始时万炮齐轰，山摇地动。15分钟后，担任左翼主攻的190师568团2营4连和5连，分两路进攻鹦哥嘴。敌人在鹦哥嘴布置了4个连的兵力，配有两门迫击炮、4挺重机枪，居高临下，严防死守，我军仰攻十分困难，指战员们冒着枪林弹雨，浴血奋战，付出了较大代价之后，终于拿下了1号高地。3营在进攻另一个制高点时，一阵暴雨铺天盖地般袭来，刹那间山洪暴发，很多战士被冲出老远。部队顶着暴雨原地坚持，待雨势稍小后继续顽强进攻。而此时，守敌打出白旗诈降。营长不知是计，正要上前受降，敌人突然开枪射击，营长中弹壮烈牺牲。战士们见营长倒在血泊之中，怒火填膺，高呼着口号“为营长报仇！”“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奋不顾身地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经过一番惨烈搏杀，终于占领了制高点，全歼鹦哥嘴守敌。

攻打任山河的尖刀营是192师574团2营。该营发动了数次猛攻，都遭到敌人的顽强阻击。战士们滞留在一道2尺来宽的沟里，暴露在敌人的射程内，伤亡很大。作为尖刀连的5连，只剩下指导员段松奎和6名战士。智勇双全的段松奎临危不惧，冷静考虑如何克敌制胜。他心生一计，对战士们交代一番，然后趁着敌人射击的间隙，7个人一起从沟里站起来，每人间隔数米，一字排开，背着枪向敌阵走去。敌人见他们枪口朝下，以为是来投降，便停止了射击，一个个交头接耳议论着什么。20米、15米、10米，越走越近，就在离敌人只有几米的时候，段松奎大喊一声：“打！”7支冲锋枪一齐怒吼，手榴弹纷纷在敌群中开花。敌人措手不及，顿时死的死、伤的伤，有的抱头鼠窜，有的跪地求饶，任山河阵地被我军胜利攻占。

担任右翼主攻的191师572团，总攻开始不久就攻下了罗家山前沿阵地。在向前推进时，3营8连被一道深沟所阻，伤亡近半。10分钟后，3营重新组织进攻。敌人的十几挺机枪组成密集火力网，封锁了我军前进的道路。8连指战员大部分伤亡，全连没有一个完整建制的班，仅有的5挺机枪打坏了4挺，六零炮弹也全部打光。在这种情况下，幸存的战士在指导员王震的带领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又发起新的进攻。机枪手王化兴端着仅存的一挺机枪，一边捡着敌人的子弹，一边射击。正在节骨眼上，机枪突然不响了！王化兴低头一看，原来枪筒已经打红。急中生智，往枪筒上撒了一泡尿，机枪又“嘎嘎”叫了起来。在机枪掩护下，突击队沿着敌人二三道防线之间的交通壕疾速前进，眼看就要接近主峰了，但敌人的枪弹如雨点般打来，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正在万分焦急之时，敌人的枪声突然停了，原来是拿下了任山河的574团及时赶到，从侧面迂回到敌人背后，一阵手榴弹把主峰的敌人解决了。经过6小时激战，黄昏时将敌正面10里、纵深30里的野战防御体系全部摧毁。



64军某部进行任山河战斗前的准备工作。（资料图片）

8月2日拂晓，64军前进指挥所与各师联络沟通，军部立即命令190师、191师继续向北追击，占领并解放固原城；192师为第二梯队；补训师负责接收俘虏、打扫战场，掩埋烈士和运送伤员，随后紧跟前进。

任山河战斗历时两昼夜，毙伤“马家军”1450名，俘虏1345名，缴获迫击炮28门、轻重机枪108挺、步枪和冲锋枪1349支、战马121匹以及其他物资。我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据战后统计，我军指战员此役牺牲了364人，占解放宁夏牺牲总数的60%。

任山河战役是我军解放宁夏的第一战，也是打得最为惨烈、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战。此役摧垮了宁夏“马家军”的士气，打开了宁夏的南大门，加快了我军解放宁夏的进程。五十多天后，宁夏全境即告解放。

为了让后人追忆这段可歌可泣的战斗历史，1955年国家投资始建任山河烈士陵园，园内共安葬烈士389名，其中1949年为解放宁夏而进行的任山河战斗中英勇牺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9兵团64军指战员364名，长征途经彭阳时牺牲的红军4名，剿匪牺牲的烈士、敌后武工队员、地下工作者、因公殉职的革命干部等21名，园内还陈列着彭阳籍一等功臣陶克叶烈士的骨灰盒。199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第三批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重点保护单位”。1997年成立了任山河烈士陵园管理所。1998年彭阳县启动了陵园改扩建工程，经过建设者们5年的艰苦努力，陵园以崭新的面貌呈现于世人面前。新陵园占地2.6万平方米，由纪念碑、烈士墓冢、革命烈士事迹陈列厅、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纪念厅、吊唁广场、工作生活区等组成。其中纪念碑高19.49米，碑阳镶嵌“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仿毛体大字，碑阴铭刻原64军军长、任山河战斗指挥者曾思玉将军的题词“正气留千古，丹心照万年”；革命烈士事迹陈列厅有反映任山河战斗的展板和烈士遗物展柜。

“青山有幸埋忠骨，留取丹心照汗青”，他们生前曾南征北战，驰骋疆场，如今长眠地下，与青山为伴，革命英烈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据固原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第一条沙漠铁路包兰铁路通车

1925年，中华民国政府最早对包兰铁路进行过几年的实地勘测，计划打通包兰铁路宁夏段。1949年初，民国宁夏省政府又给中华民国政府打报告，请示修建包兰铁路，由于当时受地理环境、技术条件、资金对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华民国政府最终也没能实施这一计划。

宁夏解放后，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非常关心宁夏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市的决定》，决定撤销宁夏省建制，与甘肃省合并为新的甘肃省。9月23日，宁夏省政府、甘肃省政府联合发布公告，宁夏省建制撤销，与甘肃省合并为新的甘肃省，宁夏省政府从即日起停止行使职权。10月，经国务院批准，铁道部对包兰铁路进行实地勘探设计，特别对火车穿越腾格里沙漠工程进行了详细勘测、调研，在没有任何经验借鉴的困难下，中央要求创造条件也要上。

包兰铁路全程999公里，铁道部第二工程局从南向北修，负责兰州至银川段，总计468公里；铁道兵某部队从北向南修，担负包头至银川段的筑路任务，全长531公里。包兰铁路全线在河套平原地区，全线路程河流交错，桥涵、沟渠甚多，动用土、石方多达1160多万立方米，越过106座大、中、小桥梁，穿过170座涵洞。在这里还应提及的是，包兰铁路在中卫沙坡头和干塘间要穿过腾格里沙漠，为有效遏制沙暴对铁路的侵袭，银川专属通知各县赶制数量众多的麦草沙障扎成方格，同时在中卫沙坡头设立铁路防沙研究所种植沙生植物，这一措施保障了铁路的安全运行。同时，这一创举也使得包兰铁路成为著名的沙漠铁路，使之成为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成为中国铁路建设的光辉业绩。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包兰铁路顺利完成施工。包兰铁路通车，连接了宁夏与西北、华北各省区，使宁夏丰富的资源得以运往全国各地，对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促进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构建工业体系都起到了巨大作用，为宁夏回族自治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飞跃发展煤炭工业、钢铁工业、石油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农村电气化，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58年8月1日这一天，还有一件喜庆大事，就是由毛泽东亲自题名的《宁夏日报》正式创刊。创刊后的《宁夏日报》第二天就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包兰铁路全线通车盛况。

这一天，上午10时，银川火车站人头攒动，锣鼓喧天，彩旗飘扬，世代没有见过火车的银川人，扶老携幼赶到火车站，好奇地看着这个用铁做成的可以飞奔的庞然大物。在火车站已经铺设好的对开铁轨上，停放着南北两辆对开的火车，一辆是开往兰州方向的，一辆是开往包头方向的。两辆火车头前悬挂着毛泽东头像和五星红旗，车身披挂着红绸，远远望去，两辆火车在一望无边的银川平原上就像两条巨龙。通车典礼仪式在铁路路基上举行，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刘格平，自治区工委书记处书记李景林、甘春雷，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哈丰阿等出席了通车典礼，刘格平为通车仪式剪彩并致词，银川市数百名中小学生手持鲜花，兴高采烈地祝贺包兰铁路胜利建成通车。

包兰线通车后，限于当时的经济条件，银川火车站没有同步建成，为了售票和货物运输，银川火车站因陋就简，在路基旁搭了一顶10平方米左右的帆布帐篷，买来算盘、磅秤，作为临时售票和货物运输的服务窗口。车票是用打字机打出后，用手推油印机印出来的。当时，银川站作为过路车站，没有始发车，只售银川—包头和银川—兰州的客车票。

老银川火车站是1959年7月份建成的，是砖木结构，建筑面积500平方米左右，有20多间房子，车站坐西向东，候车室设有两个售票窗口，一个问询处，候车室座椅是木质长条椅，可容纳100余名旅客。车站广场面积有900平方米左右。1988年，自治区成立30周年之际，新银川火车站建成，并搬迁至铁路西边的位置。2012年，银川新火车站建成起用，又搬至铁路东边原火车站的位置。

（据银川党史网）

陕甘高原的第一支红军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陕甘地区的共产党人也开始创建红军，开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新征程。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陕甘共产党人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艰辛的创建历程

1932年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简称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锦章村隆重召开。会上，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并举行授旗仪式。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成立，在陕甘地区第一次公开打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向广大人民群众公开了部队的性质和宗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区领导的武装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陕甘游击队的创建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兵运准备阶段：1929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榆林红石峡召开，会上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兵运工作主张，并通过了“三色”建军方针，即：白色（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工作）、灰色（派人做土匪武装的工作，收编“山大王”，改造哥老会）、红色（公开组织建立工农武装）。会后，兵运工作成为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一大批党员、团员相继进入陕、甘、宁交界地区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中开展兵运工作。

南梁游击队阶段：在持续不断的兵运工作基础上，1930年10月1日，刘志丹在合水县太白镇成功领导太白收枪，在陇东地区打响了向国民党武装进攻的第一枪。因活动范围多在南梁及周边地区，被群众称为“南梁游击队”。但不久队伍在宁县盘克张皮塬遭到军阀袭击，损失严重。后几经周折，1931年9月，刘志丹组织赵连璧、贾生财、杨培盛三支农民武装集合在合水倒水湾进行整编，恢复建立了南梁游击队。这是我党在陕甘边的革命斗争从兵运阶段过渡到武装斗争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西北反帝同盟军阶段：为了扩大革命武装，陕北游击支队转战陕甘边一带寻找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1931年10月20日，陕北游击支队到达合水县林锦庙，与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会师后的革命武装发展到700余人。12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要求根据“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和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变化，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于是林锦庙会师部队于1932年1月初在正宁县北柴桥子村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阶段：1932年2月12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塬锦章村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全军共360余人。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一系列军事斗争的胜利，给敌人以重大打击，并且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

重大的历史贡献

为党在西北地区建立正式红军奠定了基础。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占领职田镇、伏击阳坡头、突袭照金镇、激战艾蒿窑等，在一个多月时间里主动出击，连续作战，共歼敌1000余人，给敌人以重大打击。

1932年3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就陕甘游击队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认为“红军游击队连续不断的胜利，政治影响非常迅速地深入到农民、士兵群众中去，大大提高了农民、士兵的决心与勇气。”并提出“准备成立正式红军，怎样编制，番号如何规定，请立即答复。”中共中央于4月20日作出决议，明确“在最初应该编成红军一师。并努力求得在最短时间达到红军二师。该部队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5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历经夜袭马栏、获捷英旺镇等9次战斗，历时半个月，转战七个县，挺进700里，粉碎国民党部队的“进剿”，部队发展到1500余人。与此同时，党在国民党驻甘、陕两省的军队中相继发动了两当兵变、靖远起义、西华池起义等，成立了陕甘游击队第三、四、五、七支队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振奋了革命群众的精神，支持并扩大了陕甘游击队。12月24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在宜君转角镇（今属旬邑县）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宣布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是党在西北地区建立正式红军的开端，也标志着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为党在陕甘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准备了条件。陕甘游击队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向人民宣传了党的主张和宗旨，为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群众基础；在战斗过程中培养了大批军政干部，为根据地的建立做了干部储备；在斗争的得失成败中，积累了大量建党建军建政的宝贵经验，这些都为党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民主政权准备了条件。1932年3月20日，陕甘游击队来到正宁县，通过开展游击战争和广泛发动群众，开辟了正宁县72个村的红色区域。3月22日，在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主持下，72个村镇的赤卫队、农会代表和游击队指战员共1000余人，在寺村塬新庄子举行农民代表与游击队代表共同参加的工农兵代表会议，宣布推翻正宁县国民党政权，选举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又称“正宁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由此诞生。

（据《甘肃日报》）

中央红军长征过宁夏（下）

桃树洼阻援敌

青石嘴战斗结束后，十三大队接受后卫任务，轻装简从，背包、行李随前锋三个大队前边走，留下精干的战斗部队，在莲花沟一带警戒，阻击尾追之敌，12时以后，红军大部队都已过了平银公路，进入布山，十三大队未见尾追之敌，便撤出警戒，向青石嘴进发。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敌情，大队四位首长各一个连行动。邓飞政委随的一个连，走在最后。午后2时左右，当他们从裴家堡梁下的红土川出来，在桃树洼下过公路时，与从固原方向赶来救援被歼敌军的一支骑兵遭遇。于是，各连互相配合，各自为敌，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接着，敌步兵又赶到，但被十三大队的勇士阻击在桃树洼不能前进一步。

十三大队边打边退，6点以后，前面三个连已进入寺洼山，邓飞的这个连，才从桃树洼南面的大树根沟过了公路，从一条二米宽一米多深的河中，急行进山。这时，敌人的步、骑兵都涌到沟边。由于沟两边敌人密集，不能打枪；前面又有高山，骑兵无法展开，挥刀乱砍，步兵端着刺刀，在沟边刺。一阵乱砍乱杀中，邓飞的帽子也被挑落，但勇士们顺沟壕弓腰前进，很快上了山顶。敌人眼睁睁地望着红军越过高山后，无可奈何地撤回了营地。

是夜，红军宿营青石嘴以东十余华里的挂马沟、小沟岔、阳洼、乃河一带村庄。毛泽东住车限村东头张有仁家的一孔窑洞里。因为群众听到枪声，全部躲走，找不到食品，警卫员只好从隔壁羊圈里拉来一只羊，宰了火烤而食。第二天出发时，把钱放下。

横扫古城川

8日晨，一纵队仍为前锋，分为两路向彭阳（白杨城）前进。左路经海口、任山河，右路经沙河、羊坊，两路隔乃河并进。在任山河遇马鸿宾三十五师二三十名运输兵，将其全部俘虏。在古城以东温沟、又碰见三十五师一营，一个冲锋，敌兵四散而逃，缴获步枪八十余支，多为破旧货，大都砸毁丢弃。一纵四大队天明到达彭阳，歼灭了尚在酣睡中的邓宝珊新一军两个连队。中午，大部队相继到了彭阳，正准备休息吃饭，忽然敌机出现，投弹扫射，只得散开防空。侦察连所配备的从青石嘴缴获的马匹，被炸弹惊散，战士们为拉马，忙碌了半个小时。这时，尾追股已接近，并有迂回包围之势，于是饭没吃成，分两路进彭阳东、西两山。

为摆脱敌人，红军忍着饥饿，入夜仍在行军。左路二三纵队北上，经史家崾岘、李岔、祁小岔等地，宿营王洼一带。右路一纵队东进，经任湾、吴原，在城阳东北上长城塬，到赵家山畔、乔渠（范家园子）宿营。这些地方人家稀少，筹不到粮食，饮水也很困难，红军没收了大财主赵维新的二百多只羊和一部分粮食，不足部分，只得到地里刨洋芋煮着吃，喝涝坝里的水度过了一夜。毛泽东等在彭阳东北杜家沟上塬，经大塘，入夜到乔渠，宿乔生魁家。

入镇原去陕北

9日晨，毛泽东与右路军一起，下长城塬，经细嘴沟、马洼、火沟，与经刘塬、米塬、和沟的左路军汇合孟家塬，又折向东南，进入甘肃镇原境内。

红军离开乔渠不久，敌一支骑兵赶到。见红军已开拔，就顺大路朝长城塬东南方向追击。二三纵队经刘塬北的大阳洼台，卢业广民团自不量力，鸣枪阻击，被红军击溃，团丁抱头鼠窜。红军刚到刘家堡子时，大土豪刘杰（外号刘红头）与其子刘继（在甘肃武威马步青部当副官，时正在家）凭堡寨开枪阻击，红军一举攻克，击毙刘继元，俘刘杰（押至环县洪德城处决），没收了一部分牲畜、羊只补作军需。

10日，红军到达三岔，与刘志丹派来送信的同志相遇。由陕北同志带路，红军经洪德城、环县、元城子，19日到达吴起镇，结束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1月6日，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会师甘泉县象鼻子湾，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此，揭开了中国人民革命史上新的一页。在三岔期间，红军为民除害，解决了称霸一方作恶多端的地主武装高家湾民团，处决了民团营长白某，土豪高天斌；镇压了李家湾恶霸李茂三；没收分配了大土豪李定清的财产。中央红军的活动，为第二年（1936年）红军西征，扩大边区革命根据地，成立固北县、固原县委奠定了基础。

（据《固原市志》）